

# 从荒诞到科学：16—19 世纪西方精神疾病治疗的艺术叙事\*

刘晋<sup>1</sup> 鹿栋<sup>2</sup> 范淑英<sup>1</sup>

**摘要：**通过对流行于 16—19 世纪西方社会的“疯狂之石”“纪念性画作”与“患者肖像”等主题性绘画进行探究，认为这些美术作品以视觉形式记载了精神疾病治疗如何从荒诞到科学、从讽刺至理性的全过程，是探究当时社会文化与医学观念的重要媒介，在唤醒社会关注精神疾病、促进人文关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美术作品直至今日仍然在唤醒社会关注精神疾病、促进人文关怀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我们今天反思精神健康领域中的污名化、倡导人文关怀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

**关键词：**西方艺术，精神疾病治疗，疯狂之石，精神疾病肖像，医学图像

中图分类号：R-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25)18-0074-05

DOI：10.12014/j.issn.1002-0772.2025.18.15

**From Absurdity to Science: Artistic Narratives of Treatment of Mental Illness in the West from the 16th to the 19th Century**

LIU Jin<sup>1</sup>, LU Dong<sup>2</sup>, FAN Shuying<sup>1</sup>. 1. School of Art and Humanities,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Xi'an 710065, China; 2. Beijing Yidu Space C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Beijing 101118, China

**Abstract:** By examining thematic paintings prevalent in Western society from the 16th to the 19th century—such as the "stone of madness", "commemorative paintings", and "patient portraits"—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se artworks visually documen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ntal illness treatment from absurdity to science, and from satire to rationality. They served as crucial media for exploring the sociocultural and medical concepts of the time, whil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raising public awareness of mental illness and promoting humanistic care. Even today, these artworks continue to exert an irreplaceable influence in fostering social attention to mental illness and advancing humanistic concern, thereby offering valuable historical references for reflecting on stigmatization and advocating for humanistic care in contemporary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Western art, mental illness treatment, stones of madness, portraits of mental illness, medical images

西方对精神疾病的探究较早，公元前 5 世纪的西方学者认为精神疾病与超自然能力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古希腊、罗马时期，以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医学家认为精神疾病由自然因素、身体生理等方面引起，主张以医学方式进行治疗。中世纪以来，基督教观念盛行，教会认为精神疾病乃是魔鬼附身所致。直至 18 世纪启蒙运动兴盛，以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 1745—1826 年)、克里斯蒂安·莱尔(John Christian Reil, 1759—1813 年)、马丁·沙尔科(Jean-Martin Charcot, 1825—1893 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 年)为代表的精神医师、

\* 基金项目：2024 年西安美术学院学科建设项目(XK202417)

1. 西安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2. 北京易度空间城市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101118

作者简介：刘晋(2000—)，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东亚美术史、中国美术史。

通信作者：范淑英(1967—)，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隋唐考古、美术史。E-mail: fanshuying2005@sina.com

学者逐渐以科学方式理解精神疾病，为现代精神病学奠定了基础。

目前留存有较多数量创作于 16—19 世纪的精神疾病主题艺术作品，这些作品直观展示了其时精神病患的生存状态，反映了当时医师如何理解并治疗精神疾病。目前已有学者认识到这些艺术作品的医学价值，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发育神经精神病学诊所主任哈里斯(James C. Harris)，他在 2002—2014 年为美国医学会主办刊物《美国医学会精神病学杂志》供稿，他以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 年)《疯人院》(Bedlam)、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 1840—1926 年)《病榻上的卡米尔》(Camille on Her Death Bed)、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 年)《嘉舍医师的画像》(Portrait of Dr. Gauchet)、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 1904—1989 年)《变形的水仙》(The Metamorphosis of Narcissus)等艺术作品为探究对象，认为这些作品反映出焦虑症、精神分裂、药物滥用、自杀等精神疾病，指出艺术作为思

想的创造性表达，是了解人类状况的窗口。通过探究这些绘画作品，能够为应对疾病、创伤、冲突等提供重要作用。

哈里斯将研究重心置于画家作品，试图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与理解而达到艺术疗愈的目的。国内学界已有相关尝试，例如，邱兆芳等<sup>[1]</sup>的《文学艺术疗法合并抗精神病药物在精神分裂症行为矫正中的应用》、陈妙<sup>[2]</sup>的《绘画、艺术与精神病患者及受虐儿童绘画治疗案例》、钟文娟等<sup>[3]</sup>的《艺术行为治疗对慢性精神病患者的影响》、李玲苑等<sup>[4]</sup>的《原生艺术绘画对男性精神病服刑人员治疗效果的研究》、赵一鸣等<sup>[5]</sup>的《绘画艺术治疗在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研究概述》等研究，都聚焦于艺术行为如何治愈精神病患这一问题。还有一些学者从医疗史学角度切入，探究艺术图像的医疗史学建构。例如，卓一然等<sup>[6]</sup>以先秦时期羊图像为探究对象，分析其所内蕴的生命文化内涵；贾登红<sup>[7]</sup>梳理晚清民国时期的医疗漫画，展示了医学视觉图像背后丰富且复杂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内涵；柳紫陌<sup>[8]</sup>以中国本草道地作为切入点，探析本草图像如何作为文献依据而发挥作用。这些学者都尝试将艺术图像视作重要的史学资料以作研究，从而弥补文献研究的不足，对图像医学史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目前国内图像医学史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所利用图像数量较少、类型不足，研究焦点往往置于中国本土而缺乏国际视野等，尤其是缺乏就医学疾病有关图像的具体研究。因此，本文就医学领域的精神疾病图像进行探究，认为从文艺复兴以来的疯狂之石主题绘画，再至启蒙运动以后医师对精神疾病的理解日渐科学化、体系化，纪念性画作与患者肖像逐渐盛行。这些16—19世纪精神疾病主题艺术作品以视觉形式记载了精神病学如何从荒诞到科学、从讽刺至理性的全过程，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探究其时社会文化与医学观念的重要媒介。

## 1 “疯狂之石”与“切除愚蠢”：精神疾病治疗的荒诞

中世纪时期西方社会“精神疾病”与“疯狂”同义，被视作为神圣、恶魔、魔法和超验的混合体<sup>[9]</sup>。因此，此时人们认为颅骨环钻术(trephination)、驱魔、放血、泻药、催吐等多种方式都能够治疗精神疾病。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颅骨环钻术——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出现，通过在头骨的特定部位钻孔，进而释放被认为是疼痛源泉的魔鬼或压力<sup>[10]</sup>。

正因如此，欧洲社会对人脑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象与猜测。15世纪后，“疯狂之石”观念逐渐流行。该观念认为有些人脑中有一块石头——这是导致疯狂、愚蠢、智力障碍等负面性格或疾病的根源。当时艺术家、文学家经常创作相关寓言或讽刺作品。昆汀·马西斯(Quinten Massys, 1466—1530年)在作品《愚蠢的谎言》(An Allegory of Folly)里描绘了其时欧洲常见的愚者人物，其额头正心处有一块白色石头，即是愚蠢的象征。16世纪初，博斯(Jheronimus Bosch, 1450—1516)创作《疯狂之石的提取》(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藏，见图1)，开创了“疯狂之石”

绘画主题，并为扬·凡·海梅森(Jan van Hemessen, 1500—1566年)、彼得·怀斯(Pieter Huys, 1519—1584年)等画家借鉴承袭。直至19世纪，仍有画家以疯狂之石为主题进行艺术创作，其影响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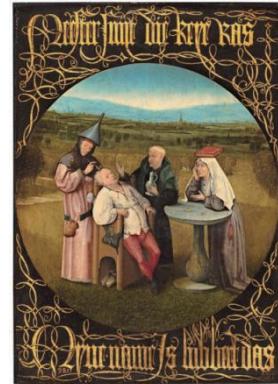


图1 博斯:《疯狂之石的提取》

《疯狂之石的提取》展现了一个头戴僧侣兜帽、戴有倒置漏斗(骗子的象征)的外科医生正在给捆绑在椅子上的老年农民进行开颅手术，附近有神职人员、修女装扮的人物注视观看。不过从头脑提取的并非石头，而是一朵黄花。画面顶部有哥特式字体铭文“Meester snijt die key ras”，意作“主人，快点把这块石头丢掉吧”。底部有“Myne name is lubbert das”，意作“我的名字是吕伯特·达斯”，表明患者身份。画中的黄花被视作人性欲望的隐喻，或是世俗金钱的象征。外科医生将黄花取出，似乎暗示教会采取“物理方式”切除置于病人头脑中的异端思想(疯狂之石)。

16世纪中叶，海梅森、怀斯、马塞勒斯·科弗曼斯(Marcellus Coaffmans, 1520—1575年)等艺术家均进行疯狂之石主题绘画创作。海梅森《外科医生》(The Surgeon)画面前景展示了五个半身人物，一位年轻男子被绑在椅子上，年迈的理发师(根据画面左侧用具，红帽老者并非医师，而是理发师)从年轻人额头处取下一块写有“IS”字母的石头。左侧年轻女子正在静心调制手术后的药膏，年迈女子紧紧地抱住年轻男子头部以免意外，只有右侧年迈男子作双手祈求状，似在同情痛苦的年轻男子。美术史学者罗德里格斯(Ana Diéguez Rodríguez)敏锐地发现前景处文本载有诗人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的两首诗，以此为切入点，指出这幅画作是一幅战争讽刺画<sup>[11]</sup>，疯狂之石意味着对战争正义性的怀疑，理发师作为既得利益的投机者将“怀疑”予以切除，具有深刻的政治隐喻内涵。

怀斯《取出愚蠢之石的外科医生》(A Surgeon Extracting the Stone of Folly)通过货架摆放的药罐与书籍，描绘了一场庸医为病人进行开颅手术、取出象征愚蠢石头的闹剧。药罐贴着“conserva van wespen”(黄蜂保护)的标签，以黄蜂喻作欲望。两本书籍分别名为 Lector Brodronk《鲁莽讲师》与 Dotor Mallart《野鸭医生》，暗示治疗疾病的医师

水平低劣，具有极强的讽刺效果。

科弗曼斯作品《愚蠢之石的提取》（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见图2）是对博斯《疯狂之石的提取》的模仿，两者画面布局、构图高度相似，因此在19世纪末被认为是博斯的作品。1927年，美术史学者弗里德兰德（Max Jakob Friedländer）对其进行重新考证，认为这是科弗曼斯在1550年间完成的模仿作品<sup>[12]</sup>。这两幅作品就具体场景绘制存有较大差异，科弗曼斯摒弃了《疯狂之石的提取》内黄花、倒置漏斗、修女头顶书籍等具有讽刺效果的装饰，所绘患者表情平和并带有若隐若现的微笑。画面效果不复博斯、海梅森与怀斯作品所具有的强烈讽刺性与激烈感，反而洋溢着静谧祥和的平淡气息。因为现存资料较少，难以判断科弗曼斯如此描绘的原因，不过能够确定其画面意趣已与博斯大相径庭，不具明显的讽刺表达。



图2 科弗曼斯:《愚蠢之石的提取》

海梅森、怀斯均从博斯处汲取营养，但都对原有的宗教元素予以淡化，展现出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海梅森描绘的理发师是不懂医术的投机者，通过各种方式哄骗“病人”而获取利益。在艺术表现方面，理发师是增强绘画场景寓言性、戏剧性的核心人物，蕴含着深邃的政治暗喻。怀斯塑造的是自以为医术精深却漏洞百出的无能庸医，迎合“中世纪的外科医生甚至经常被等同于屠夫和杀人犯”的社会认知<sup>[13][30]</sup>。17—18世纪的艺术家雅各·卡特斯（Jacob Cats, 1577—1660年）、彼得·夸斯特（Pieter Quast, 1606—1647年）、巴塞洛缪斯·马顿（Bartholomeus Maton, 1641—1684年）等延续并综合海梅森、怀斯的价值取向，使疯狂之石主题绘画更具公开性与娱乐性，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如夸斯特描绘了一幅公共空间内的“手术景象”，居于画面中心的病患痛苦难忍，而两侧的商贩与行人却面带笑容，流露出好奇与惊讶，像是在观看一场滑稽表演。事实或许如此，在16世纪10年代出版的《流浪之书》（*Liber Vagatorum*）劝诫百姓要“提防那些在全国各地游走的医生，他们出售草药和草根，并吹嘘自己有很好的疗效”<sup>[13][24]</sup>，当时有一些自诩为医师的表演者会进行巡回“演出”，他们在手中提前藏有一块石头并隐秘地放入伤口处，向观众展示疯狂之石以牟取利益。

16世纪以来的疯狂之石主题绘画通常并非实际发生的医学场景，而是其时欧洲社会观念的艺术呈现，反映了时人如何理解与对待精神疾病。例如，创作于1620年的版画作品《治愈幻想的医师，通过药物清除疯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见图3），一名医师将患者推入熔炉，而患者的头颅随着熔炉的熔炼而喷涌出各式愚蠢、癫狂与无知的幻想。其与疯狂之石主题绘画一致，并非真实的现实场景，而是通过荒诞不经的艺术场景体现社会观念及其价值取向，通过批判荒谬而追寻理性实现。然而从另一视角来看，“疯狂之石”承载了对不懂医术却哄骗病患的庸医所进行的猛烈批判，藉“庸医”形象讽刺蒙蔽人们从而获取利益的投机者，以及通过“疯狂之石”场景表达艺术家个人诉求与政治隐喻等多种内涵，真正遭受痛苦的精神病患却在艺术家笔下难以得到同情与理解，反而在嘲讽与批判的艺术创作中不断受到伤害。



图3 马塔厄·格罗伊:《治愈幻想的医师,通过药物清除疯狂》

## 2 精神病学先驱与病患：精神疾病治疗的科学与理性

法国哲学家福柯<sup>[14][68]</sup>（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年）指出，“所有与非理性沾边的罪恶，都应密藏起来。古典时代因这种非人性存在而感到耻辱。”中世纪以来，多数医院都会设置治疗精神病患的科室，并出现专门用于精神治疗的医院。17—18世纪，私人开设的精神病院已初具规模。与中世纪不同，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知有所转变，即精神疾病不再涉及个人的灵魂或道德责任，而仅仅是一种身体疾病<sup>[9]</sup>，进而将精神病患视作麻木不仁的野生动物。暴力行为有助于抑制动物性的激情与狂野，所以精神病院较中世纪更加常用身体拘束、鞭打等暴力行为对待精神病患。正如英国精神病学家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 1621—1675年）所言：“对待疯子需要运用威胁、束缚、殴打等方式。这样就可以对他的行为举止施加警告、责骂或惩罚，使他保持克制。”<sup>[15][96]</sup>有些精神病院甚至将精神病患当作动物进行演出，英格兰伯勒姆皇家医院（Bethlem Royal Hospital）在“每个星期日展览精神病人，参观费为一便士”<sup>[14][68]</sup>。

西班牙画家戈雅（Francisco de Goya, 1746—1828年）作品《疯人院》（Corral de Locos）便是对其时精神病患生存处境的真实写照，戈雅称自己目睹萨拉戈萨（Zaragoza）恩典圣母省立医院（Hospital Provincial de Nuestra Señora de Gracia）的病患相互打斗，而护理人员竟以鞭子抽打他们，因此创

作这幅作品以揭露“罪恶”。恩典圣母省立医院修建于1425年，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医院之一，后来成为世界第一所在精神疾病领域应用职业治疗的医院，梵蒂冈授予其金独角兽奖以作奖示。然而戈雅所描绘的精神病院与文本史料截然不同，在画面中心，两个赤身患者仿佛古典戏剧的摔角手般进行搏斗，后景处有几名穿着破旧白色长衣的患者为他们鼓掌喝彩，一名身穿黑色服饰的护理人员则使用鞭刑阻止他们。左侧患者合拢双臂，面色惊恐地直视前方。右侧患者似乎对这种场景习以为常，作出具有嘲讽或讽刺意味的鬼脸。右侧身着绿色、棕色服饰的患者则面对墙壁，身着这种颜色制服的患者通常问题较少，很少参与冲突事件。

恩典圣母省立医院在17世纪对于精神病患的治疗确实不尽人意，例如，强迫精神病患在恶劣环境内进行无偿工作，医院提供食物质量过差从而导致大量病患死亡等。18世纪下半叶，医院陆续出台增加床位、改善环境等政策，当时被称作治疗痴呆疾病的最好的医院。然而戈雅宣称这幅创作于1794年的作品所描绘场景是医院的真实情况，为画家本人亲眼所见。艺术作品成为了描绘其时精神病院阴暗面的重要载体，以文本所不及的直观图像形式记录了精神病患的苦痛与悲惨。

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医生主张以人道主义对待精神病患。1785—1788年意大利医生文森佐·基亚鲁吉(Vincenzo Chiarugi, 1759—1820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圣多罗蒂亚医院(Santa Dorotea hospital)担任院长，在职期间他主张以铁链约束精神病患是非法手段。他指出“长时间的束缚总是会刺激并加剧兴奋和愤怒，仅铁链的声音就会引起难以言表的恐怖并加剧疯狂”<sup>[16]</sup>。菲利普·皮内尔则将铁链解放运动推向了高潮，他以启蒙运动与法国革命的人权理念作为治疗精神疾病的宗旨，认为“疯狂的概念绝不意味着人会完全丧失精神能力。相反，精神错乱通常只会影响一部分能力，如观念感知、判断、推理、想象、记忆或心理敏感性”<sup>[17]</sup>，主张以人道方式对待精神病患，被誉为“现代精神病学之父”。1792年后，皮内尔在比塞特尔(Bicêtre)疗养院进行工作，传闻他将疗养院受铁链束缚的精神病患予以解放。许多艺术家或出于自发心理，或出于委托，以此事件为主题而进行艺术创作，将皮内尔塑造为伟大的精神病学先驱与“解放者”，进而表达对精神病学走向体系化、科学历史进程的纪念与歌颂。

法国艺术家查尔斯·穆勒(Charles Louis Muller, 1815—1892年)、罗伯特·弗勒里(Tony Robert-Fleury, 1837—1911年)都以皮内尔解放精神病患事件为主题进行过绘画创作。第一幅作品穆勒的《皮内尔于1792年为精神病患者解除枷锁》(法国国家造型中心藏，见图4)中心是皮内尔与学生埃斯基罗尔(Jean-Étienne Dominique Esquirol, 1772—1840)，皮内尔正在命令工作人员将左右两旁曾被铁链捆绑的病患予以解放，手持书卷的埃斯基罗尔则虚心学习。

周围萎靡不振的精神病患与英姿飒爽的皮内尔形成鲜明对比，增强了画面感染力。弗勒里在19世纪70年代受法国政府委托，为皮内尔创作绘画，目前有两幅构图相近的作品值得注意。第一幅作品应是艺术家的创作草稿，画面背景阴沉，人物的脸部模糊不清，身着黑色绅士服的皮内尔直视着跪在面前的精神病患，充满同情。第二幅作品《皮内尔为疯癫者解除枷锁》(萨尔佩特里埃医院藏，见图5)是第一幅作品的“具象化”，皮内尔忧心忡忡、神色复杂地面对精神病患，画面中心处穿着黄白相间长裙的女子正在被医护人员解开铁链，女子面容悲切麻木，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画家在右侧描绘了几位亟待解救的精神病患，他们面容枯槁并近乎扭曲，显然深受压迫。



图4 穆勒:《皮内尔于1792年为精神病患者解除枷锁》



图5 弗勒里:《皮内尔为疯癫者解除枷锁》

事实上，皮内尔从未在比塞特尔疗养院主持解放精神病患事务。在比塞特尔疗养院工作期间，皮内尔与主管医师普桑(Jean-Baptiste Pussin, 1746—1811年)交往甚密，并接受其人道治疗主张。1797年，皮内尔调往萨尔佩特里埃医院(Hôpital de la Salpêtrière)，普桑则在比塞特尔疗养院继续主持工作，并宣布禁止使用锁链来困缚患者。1798年，皮内尔邀请普桑协助他的工作，并在萨尔佩特里埃医院颁布了锁链禁止政策<sup>[18]</sup>。穆勒的画作标明事件发生时间为1792年，日阿贝尔埃斯基罗尔在1799年才来到巴黎并向皮内尔学习，画作与事实并不相符。关于其原因，有学者认为是皮内尔儿子希皮翁·皮内尔(Scipion Pinel, 1795—1859年)、学生埃斯基罗尔的有意为之，这与他们对于精神疾病的理解及政治取向存有密切关系<sup>[19]</sup>。弗勒里受法国政府委托进行创作，因此他的画作标题写明皮内尔是在萨尔佩特里埃医院而非比塞特尔疗养院主持解放事务。同时他的绘制逻辑更为激进，着力彰显皮内尔的“神圣事业”，尤其是位于左侧亲吻皮内尔手背的老妇人——这种行为往往被用于描绘君主与圣人。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并不完全认同皮内尔的医学行为，这与艺术作品中的“解放者”形象大相径庭。例如，福柯指出皮内尔虽然主张废除铁链限制，但是他主张使用冷水浴、紧身服等所谓厌恶疗法，使审判与惩罚的形式内

化，本质是将肉体压迫转变为精神压迫<sup>[15]244-249</sup>。从这层意义来讲，交织有不同社会阐释、阶层理解的艺术图像展示了一个复杂的皮内尔形象，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皮内尔提供了崭新思路。

不同于穆勒、弗勒里对于精神病学先驱的着力描绘，艺术家杰利柯(Théodore Géricault, 1791—1824年)将视角对准精神病患，以真实客观却又不失人文情怀的笔触描绘了当时精神病患的真实境况。杰利柯曾因为忧郁症接受精神病学医师乔治特(Étienne-Jean Georget, 1795—1828年)的治疗，乔治特希望以严谨态度探究精神疾病，故委托杰利柯绘制10幅(现存5幅)精神病患的肖像，这些艺术作品被视作19世纪浪漫艺术与实证科学的桥梁。

杰利柯在创作过程中重视客观性与严谨性，着力表现尽可能真实的患者状态，主体是精神病患的正面半身肖像，完全不复中世纪以来对精神病患的“可笑观感”与“轻蔑视角”，而是将精神病患视作可尊重、可理解的活生生的人物。以《偷窃狂的肖像》(比利时根特美术馆藏，见图6)为例，其深沉的背景颜色具有忧郁气质与反思精神，使画面内涵更为深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标题以疾病命名而非病患姓名，似乎表明画家并不希望将“疾病”与“个人”联结起来，即精神病患并非疾病本身，而仅是疾病的一种表征。



图6 杰利柯:《偷窃狂的肖像》

“在古典时期，疯癫被隔着栅栏展示。凡是在它出现的地方，它都被隔出一段距离，受到某种理性的监督。这种理性不再认为自己与之有任何联系，不允许自己与之有过于相似之处。疯癫变成某种供观看的东西，不再是人自身包含的怪物，而是具有奇特生理机制的动物，是人类长期受其压制的兽性。”<sup>[14]70</sup>在福柯的论述中，疯癫者成为被理性社会及其运行体系排除的存在，是被观看、被嘲讽、被蹂躏的“非人者”。杰利柯出身于一个具有精神疾病史的家庭，父辈中有人死于精神疾病，他本人亦深受其困扰。医师乔治特与埃斯基罗尔关系甚密，所持观念相同，都认为精神疾病本质是一种器质性的痛苦，而非道德堕落或魔鬼附身<sup>[20]</sup>。结合多方面原因，杰利柯能够切身理解到精神疾病的苦痛，对精神病患抱有深刻同情，其画作能够正视并同情精神病患的境遇，将其视作一种正常的人类痛

苦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乔治特试图从相貌特征理解精神疾病，例如，“白痴的脸庞愚蠢而又呆滞，毫无意义”“狂躁症患者的面部常常扭曲与抽搐，表现出不安的感觉”<sup>[20]</sup>。杰利柯的作品并不完全符合乔治特的医学理念——患者肖像没有僵化、死板而又典型的相貌特征。因此，这些作品不能被简单归为委托作品，而是融汇艺术家、委托人、模特及其不同社会场域文化的综合体，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表达了深切的人文关怀。

中世纪以来，精神病患往往被视作理性社会的边缘角色，甚至被视作“非人”的存在。即使是广受赞誉的精神病医院，亦被艺术家视作藏污纳垢的罪恶之地。皮内尔解放病患主题绘画、杰利柯精神病患肖像系列绘画则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精神病学史的两种主体及其叙事逻辑：前者彰显并歌颂做出伟大贡献的精神病学先驱，精神病患是强化先驱形象的助推剂；后者同情并理解处于苦痛境况的精神病患，其中没有精神病学先驱的位置——或许暗示先驱无法理解精神病患的切身苦痛。

### 3 结语

从聚焦于精神疾病治疗的疯狂之石主题绘画，到展现精神病院现实场景的艺术作品，至启蒙运动盛行的纪念性画作与医学肖像，这些16—19世纪的西方艺术作品通过视觉形式展现了中世纪以来精神病学如何从荒诞至科学、从讽刺至理性的发展历程。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文主义日渐盛行，然而饱受折磨的精神病患却仍然被排斥在主流视野之外。在这场宏大的思想变革中，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和治疗方式也随之演进。随着启蒙运动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们通过艺术为这些被边缘化的精神病患群体发声，这无疑是对病患尊严的肯定，也标志着艺术在展现人文关怀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反映了启蒙运动所强调的对普遍人性的关注，与19世纪日益强调的人文关怀精神高度契合。这些西方艺术作品作为内蕴着社会不同阶层及其观念的重要载体，为我们理解其时社会文化与医学观念提供了崭新思路，揭示了知识、权力与伦理在精神疾病领域的复杂交织。

然而这些艺术作品的价值不止于此，它们以其独特的视觉力量和情感穿透力，在今日仍然能够发挥作用，推动着医学和社会对待精神病患态度的转变。进而唤醒社会关注精神疾病、促进人文关怀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为我们今天反思精神健康领域中的污名化、倡导人文关怀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下，能够为当代精神健康领域中如何利用艺术的力量，促进社会理解和减少污名化提供新的思路与启示。

通过深入挖掘这些历史深处的对话，这些艺术作品的阐释与理解为当代社会精神健康领域中如何平衡科学治疗与人文关怀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并为我们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更富理解力的社会，提供了持续的理论力量与实践启示。

(下转封三)

根,促进医学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健康,都是开启医学伦理学新征程面临的担当。医学伦理学走进医学实践,走进临床,是医学伦理学理论的终极目标,医学伦理学者要重点盯住临床伦理,和临床医生一起协同前进。

## 5 《医学伦理学基础》的价值分析

《医学伦理学基础》是杜治政教授直面当代中国医疗实践对医学伦理学一系列基础性问题进行的深刻研究,是我国医学伦理学在理论创新与实践重构领域开创性探索的重要标志,兼具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深厚的理论价值,在学科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实践意义层面看,《医学伦理学基础》从当今医学的现实出发,直面资本与技术和权力、直面医学新质技术、直面医患利益关系和利益冲突、直面将患者利益置于首位面临的困难与阻力、直面医师职业精神的某些变异、直面临床实践和科研,直面这些方面的伦理社会问题,采取不回避、不粉饰、不辩护、不绕道的态度,探索破解之道,确保医学发展始终以患者福祉为核心。

从理论价值层面看,《医学伦理学基础》系统梳理了医学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与思想脉络,构建起以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利益伦理、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伦理一元与多元、医学专业精神与医学伦理为核心的完整理论体系,

为医学实践提供了坚实的伦理根基,推动医学从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人文关怀的转化。

从学科建设层面看,《医学伦理学基础》既是医学教育的基础教材,也是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桥梁。将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引向培养医学生时代敏感度与职业使命感,塑造“德术并重”的医学人才,同时为法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的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助力构建更完善的医学伦理生态体系。

《医学伦理学基础》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重构,为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构建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推动了医学教育核心价值的深化与拓展。该著作的出版不仅标志着我国医学伦理学研究的重要突破,更在学术界和医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如培根<sup>[3]</sup>所言: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将把珍贵的思想传送给一代又一代。《医学伦理学基础》必将辉映人类伦理思想史册。

## 参 考 文 献

- [1] 杜治政. 医学伦理学基础[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25.
  - [2] 杜治政. 医学伦理学发展新阶段的历史使命[J]. 医学与哲学, 2024, 45(1): 6-12.
  - [3] 培根. 培根随笔全集[M]. 李家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86.
- 收稿日期: 2025-08-15  
修回日期: 2025-09-12  
(本文编辑: 邹明朋)

(上接第 78 页)

## 参 考 文 献

- [1] 邱兆芳, 张艳秋, 李遵清. 文学艺术疗法合并抗精神病药物在精神分裂症行为矫正中的应用[J]. 济宁医学院学报, 2003, 26(4): 51.
  - [2] 陈妙. 绘画、艺术与精神病患者及受虐儿童绘画治疗案例[C]//中国心理学会. 第十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论文摘要集. 上海: 中国心理学会, 2005.
  - [3] 钟文娟, 罗汝琴, 黄之玉, 等. 艺术行为治疗对慢性精神病患者的影响[J]. 中国康复, 2014, 29(4): 358-359.
  - [4] 李玲苑, 黄婷. 原生艺术绘画对男性精神病服刑人员治疗效果的研究[J]. 司法警官职业教育研究, 2020, 1(1): 13-18.
  - [5] 赵一鸣, 陶慧, 祝健瑛, 等. 绘画艺术治疗在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研究概述[J]. 心理月刊, 2024, 19(3): 221-223.
  - [6] 卓一然, 王明强. 先秦图像中羊的生命文化含蕴初探[J]. 医学与哲学, 2020, 41(11): 76-78.
  - [7] 贾登红. 医疗漫画: 医疗社会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素材[J]. 医学与哲学, 2021, 42(5): 72-75.
  - [8] 柳紫陌. 图像在 15 世纪中国本草道地知识建构中的作用[J]. 医学与哲学, 2024, 45(6): 62-66.
  - [9] LAFFEY P. Psychiatric Therapy in Georgian Britain[J]. Psychol Med, 2003, 33(7): 1285-1297.
  - [10] RICHARD R. Mysteries of the mind[M].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2000: 181.
  - [11] DIÉGUEZ R A. "La extracción de la piedra de la locura" de Jan van Hemessen y el Maestro de Pablo y Barnabás del Museo del Prado[J]. Boletín del Museo del Prado, 2014, 32: 119.
  - [12] FRIEDLÄNDER Max J. Die Altniederländische Malerei: Geertgen van Haarlem und Hieronymus Bosch[M]. Niederlande: Leiden, 1927: 153.
  - [13] WAUTERS W. 'Extracting the Stone of Madness' in perspective.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n enigmatic visual motif from Hieronymus Bosch: A critical status quaestionis[M]. Antwerp: Garant Publishers, 2018.
  - [14] 福柯. 疯癫与文明: 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 [15] MACDONALD M. Mystical Bedlam: Madness, anxiety, and heal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16] GERARD D L. Charugi and Pinel considered: Soul's brain/person's mind[J]. J Hist Behav Sci, 1997, 33: 395.
  - [17] WEINER D B. Philippe Pinel's "Memoir on Madness" of December 11, 1794: A fundamental text of modern psychiatry[J]. Am J Psychiatry, 1992(6): 729.
  - [18] WEINER D B. The apprenticeship of Philippe Pinel: A new document, "observations of Citizen Pussin on the insane"[J]. Am J Psychiatry, 1979(9): 1128-1129.
  - [19] WALLACE E R, GACH J. History of Psychiatry and Medical Psychology: With an Epilogue on Psychiatry and the Mind-Body Relation[M]. 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8: 282.
  - [20] POLLITT B. Théodore Géricault, Portraits of the Insane[EB/OL]. (2015-08-09)[2025-08-27]. <https://smarthistory.org/gericault-portraits-of-the-insane>.
- 收稿日期: 2024-06-03  
修回日期: 2025-09-01  
(本文编辑: 于磊)